

# 从新出土资料再论“项梁铸大钱”

冀 和

(宿州市文物管理所 安徽宿州 234000)

**内容提要:**河南省新郑“郑韩故城”相继出土了几批古钱范和一处古钱币窖藏,其中“异形布”的归属与出现各国货币的现象一直有争论,根据伴出的兵器性质以及当时西楚政权控制封地经济、楚汉相争楚军败退等历史资料分析,这批钱范和钱窖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最符合项羽西楚政权的历史背景,它们都应属西楚政权时期遗存。

**关键词:**新郑 钱范 钱币窖藏 异形布

**中图分类号:**K875.6

**文献标识码:**A

1983~2004年在河南省新郑“郑韩故城”内相继出土了几批古钱范和一处古钱币窖藏坑。其中,1983年11月在东城大吴楼铸铜遗址东部边沿区发现“施布当圻”和“四布当圻”布币陶范三套<sup>[1]</sup>。2004年12月“在新郑城区东北部的月季新城小区建筑施工中,挖掘机铲出了一窖东周布币……钱窖上半部分散落的钱币共有117枚,均为平首布,形制包括桥足布、锐角布、方足布、方足二连布等……币面文字共有十三种”<sup>[2]</sup>,出土地点原是韩国官营制陶(瓦)作坊区<sup>[3]</sup>。以下简称“钱窖”和“钱范”。

钱窖里的“四布当圻”布与1983年大吴楼出土“四布当圻”布范相同,可见钱窖与钱范关系密切,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它们并互为佐证的资料。其中“施布当圻”布(或称施钱布、扶比当圻、扶菱当圻,图一)和“四布当圻”布(或称连体布、方足二连布、四比当圻,图二)归属何时代、国别、政权的问题很久以来在泉界纷讼不休。笔者亦撰文参与讨论<sup>[4]</sup>。因后来方见该钱窖资料,认为这一发现对该论题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就此再作进一步讨论。以下权且称“施布当圻”和“四布当圻”二布币为“异形布”,因“清代泉志多认为它同三晋通行的布币形体相异”<sup>[5]</sup>(与学术界称锐角布为“异型布”或“异形布”有别)。

## 一 学术界对“异形布”币时代、国别的争论

究竟“异形布”是何时代、国别、政权铸行,代表性认识主要有“秦末‘项梁铸大钱’”说<sup>[6]</sup>和“战国晚期楚币”说。这两种观点目前都缺乏令人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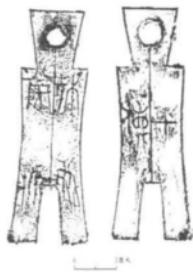
的理由,“至今尚未达成共识”<sup>[7]</sup>。因大小“异形布”范在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内出土,也有学者认为应属韩国货币。还有学者据郑韩故城遗址出土钱范中有“赵‘离石’、‘蔺’圆足布、‘甘丹’刀、魏桥足布等”多种仿铸钱范,指出“并不能据此而认定‘扶比当圻’、‘四比当圻’等布钱就是韩国自身的货币”<sup>[8]</sup>。笔者曾以异形布作切入点研究战国晚期楚国政权性质,发现“异形布”似乎不应属战国货币,罗伯昭先生的秦末“项梁铸大钱”的认识较合实际<sup>[9]</sup>。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长足发展和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sup>[10]</sup>在不断深入证实这一认识<sup>[11]</sup>。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钱窖与钱范更是确定“异形布”为秦末“项梁铸大钱”的新资料。

## 二 关于钱范和钱窖的疑惑

具有“社会的权力”<sup>[12]</sup>的货币对于管理国家机器是极其重要的杠杆,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货币铸造和发行权的分散起到了“助产”作用。如西周王室铸行货币的同时,允许分封的诸侯们在封地铸钱,导致“到了春秋战国,周王室微弱,甚至等于不存在,诸侯们相继称王,俨然成了独立的国家。他们专地专民,当然也专断了货币铸造权”<sup>[13]</sup>。分散铸币权的社会危害再如西汉初放任地方铸币,“故吴国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sup>[14]</sup>,结果刘氏出现“吴楚七国之乱”。正由于货币的作用可以全面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深知这一事理,故韩国何以铸行赵、魏等多国货

收稿日期 2010-1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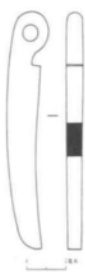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冀和(1949~),男,安徽省宿州市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钱币铜镜、历史地理。



图一//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蕲县镇出土施布当折拓片



图二// 河南省新郑郑韩故城  
钱窖出土四布当折拓片



图三// 河南省新郑郑韩故城  
钱窖出土铜质机械构件

币? 如仅以边境贸易需要是说不通的。

方家对有些平首布国别认识不一, 就是因在一国内出现多个国家的货币和钱范。考古资料反映韩都郑韩故城内不仅出土别国货币, 而且出土不止一国钱范, “韩都内发现的仿铸范种类之多令人惊讶……与韩接壤的诸国货币韩国几乎都仿铸”<sup>[15]</sup>, 钱范和钱窖反映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 三 解读钱窖和钱范

上述钱范和钱窖虽然都发现于郑韩故城遗址区内, 但出土地点分别位于东北部和东南部, 相距数里, 似无直接关系, 说明钱窖中的货币已处于流通之中。

首先分析钱窖。从残存的下半部分看, 中央是排列整齐有序、数量不少的布币, 在“两排布币的两边和一侧, 是摆放相对较为散乱的布币, 夹杂有铜质机械构件、铜矛、铜镞等”<sup>[16]</sup>。铜质机械构件窄长条形, 约长11、宽1.0~1.6、厚0.9厘米, 窄的一端微弧弯(图三), 笔者认为: 应是弩机部件悬刀。其与长沙左家塘新生砖厂15号墓出土的战国晚期楚弩悬刀相同<sup>[17]</sup>, 只是长度偏长; 与汉代弩机长方形悬刀截然不同。从前人对楚弩悬刀战国中期约长6.7、宽0.5~1.5厘米和晚期约长8、宽0.6~1.2厘米的研究看<sup>[18]</sup>, 该悬刀较长且宽。从发展趋势推断, 应是在战国晚期基础上改进的, “而秦弩形状和前述楚弩相近, 只是牙较宽肥, 悬刀亦较宽短有力”<sup>[19]</sup>。铜矛, 矛身横断面微呈菱形; 脊两侧无血槽, 两边刃的中部均微向内弧; 铍较短, 呈直筒, 銎口椭圆近似菱形。该矛形制类似新郑白庙范村北战国晚期兵器坑出土I式矛<sup>[20]</sup>和陕西临潼秦俑坑出土秦代铜矛<sup>[21]</sup>, 此矛身形也与湘乡可心亭出土的汉代矛身相同<sup>[22]</sup>。这件矛的铸造年代应居于战国晚期与汉代之间承上启下时段。与悬刀和矛伴出的铜件中还有两个一端有口的圆管状铜器: 一件稍长(不便测量); 一件较短, 长5.7、直径3.7厘米。它们应是矛、戈、戟等兵器秘末端铜饰镞、鏃。铜镞, 与

战国末至汉初的镞相似<sup>[23]</sup>, 三弧刃; 有的呈三平面, 横截面呈等边三角形; 有的两刃之间微凹, 横截面呈三边向内凹弧三角形。

从钱窖中伴出兵器, 可知这批钱币的用途性质与军费、军饷有关。属何军队所有? 从兵器的整体特征看应界于秦汉之际; 从出土弩机悬刀与战国中、晚期的楚弩悬刀长度有区别, 与秦弩悬刀有差异, 又与汉代弩机悬刀截然不同看, 推测这支军队应该是秦楚之际楚汉相争的项羽部队。刘邦与项羽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相继五年, 其间基本在中原地区逐鹿, 主要相持于荥阳(河南荥阳东北)、成皋(河南巩县东北)一带。新郑在秦灭韩以后设县, 为县治所, 当时属项羽“西楚”政权控制下的颍川郡<sup>[24]</sup>, 处于前方地区。一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项羽所领导的“西楚”马背政权有必要在这里设立临时军政中心。因为新郑经历自春秋到战国相继被作为国都的郑国和韩国的长期建设, 城市条件好, 冶铸业发达, 兵器制造精良; 又有洧水、颍水、汝水连接淮水、鸿沟、睢水等优越水陆交通条件, 从而保障与以泗水郡为中心的大后方联系。作为军事家的项羽很可能看中这里作为临时军政中心。由此, 对郑韩故城出土钱范和钱窖的疑惑及其相关问题可认识如下:

1、郑韩故城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秦代文化层, 因秦代时间极短, 物质文化形态变化的滞后性使得我们对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认识基本包容在战国晚期里了, 往往不太容易区分。

2、在郑韩故城遗址中出土了这么多仿铸的别国货币, 还有大小“异形布”范和锐角布、桥足布、方足布等钱范, 包括了钱窖中平首布的几种形制, 可以认为, 钱窖与这些钱范是同时期历史遗物, 钱窖中的钱币也应该就是这些钱范所铸行。鉴于这些钱范“据地层及遗物均为战国晚期”, 基于第一点认识, 它们与项羽的“西楚”政权不无关系。从出土钱范的冶铸遗址出土文物资料反映出了当时生

产内容杂乱,体现出非常形势下政权管理的松散无序,符合楚汉相争历史背景。

钱窖和钱范均发现于郑韩故城的外廓城内。钱窖出土地点位于文化层单一的韩国官营制陶(瓦)作坊区,且“埋藏很浅,直接开口在耕土层下”<sup>[29]</sup>。与“异形布”范出土地点大吴楼铸铜遗址相去甚远,应无直接关系。笔者认为:项羽利用制陶作坊区驻扎军营,因临时军政中心各衙署均应设在内城,而这里正处在宫城区所在的内城东城墙两座东门外,起着守卫内城作用。项梁、项羽起事的目的是推翻秦朝建立新政权,所以要铸行自己的新型货币(异形布)<sup>[26]</sup>。为了联合原东方各诸侯国旧贵族力量,他们打的是复国旗号。因此,项羽建立的“西楚”尽管是处于战争中的马背政权,不仅继续铸行大小异形布作为主币主要在所“王九郡”中流通<sup>[27]</sup>;同时为控制他所封的各地地方诸王领地经济,就以仿铸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货币的便捷方式代行各王领地流通货币,以临时实现他的政治、经济集权。

3、我们注意到大小“异形布”范不仅制作较规范、精良,其范体形状也有别于其它钱范,且并排置于陶盆内再行埋藏,可见小心翼翼。这些现象不仅表明“异形布”范的重要性,而且反映当时处于一种非常形势下。此当与战事紧张、形势变故急迫有关。因“异形布”是“西楚”政权大面值主币,不同于随意性刻制钱范仿铸货币,所以要尽量保全,不便或来不及带走就掩埋,为防落入敌手。

#### 四 上述认识的历史依据

项羽于公元前206年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地方王侯及领地刚完毕,就发生了地方诸王国间争夺疆土的激烈战争。汉王刘邦遂乘机自汉中出兵灭雍、塞、翟三国,以陕西渭河流域一带的关中为根据地与项羽开始了争夺天下的斗争。双方曾长期相持于荥阳、成皋一带。颍川郡就成为战争中“西楚”的前方地区。项羽在楚汉战争之初就非常重视这里的战略地位,公元前206年“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sup>[28]</sup>。此后的3年中,楚军与汉军在荥阳和成皋一带常相战。公元前203年前后,楚汉争夺荥阳和成皋的战事屡有发生,楚“与汉俱临广武(荥阳东北广武山)而军,相守数月”<sup>[29]</sup>;史载:“汉王军荥阳南……与项羽相距岁余。”<sup>[30]</sup>可见英勇善战、惯于亲临前线的项羽必须只有借助新郑优越的城市条件,在这里设立“西楚”政权临时军政中心兼顾军事和行政。这个事实从下面的史料记载可进一步印证。

公元前203年,当彭越再度攻占梁地“绝楚粮”时,“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开封市东南)、外黄(兰考县东南)”<sup>[31]</sup>。说明北边成皋前线是由曹咎直接指挥,项羽的指挥中心在南面新郑。若在成皋,项羽率军也就没有“定梁地”后回来“复从将军”之说了。当项羽在睢阳(商丘县南)接报曹咎兵败,率军回救时,“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sup>[32]</sup>又说明楚军在成皋和荥阳前线部署的不是一支部队;项羽亲率的主力部队只有在新郑才能机动作战。

与这些钱范和钱窖的埋藏关系最大的战事应在公元前202年初。西楚因“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sup>[33]</sup>。项羽愿与刘邦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归汉、东属楚,楚“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就在汉军为接回刘邦父母妻子而欢跃之时,刘邦听从了张良、陈平二人建议,趁机灭楚。项羽深知刘邦的为人狡猾,在两军对垒的态势下东撤要迅速,楚军必然是仓促张皇的。果然“汉五年(元月)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河南太康)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sup>[34]</sup>。楚军只有从新郑东撤楚都彭城(今徐州)才会途经阳夏。因而才有今天在郑韩故城遗址中经考古科学发掘呈现在面前的这些埋藏现象。

#### 五 结语

由于物质文化形态变化的滞后性使我们对时间极短的秦代文化现象的认知与战国晚期往往难以明确区分,甚至影响到汉初。这是造成上述钱窖和钱范等发现令我们困惑的原因。它们是研究“异形布”币时代和铸行政权归属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古兵器“弩机为楚民族的创造”<sup>[35]</sup>,打着复楚旗号的项梁和项羽是从故楚地起兵的,随军主要军工人员必是楚人,其冶铸兵器的工艺和形式定呈楚风。楚汉相争,“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sup>[36]</sup>,这期间项羽只有得益于选择地理和城市条件好的新郑为临时军政中心,才有使“汉常困”的好形势。因战国时期韩国冶铸业发达,其兵器制造精良,“韩国都郑铸造兵器的冶至少分属四个库……冶铸兵器的作坊多……”<sup>[37]</sup>故有“强楚劲郑”(《盐铁论》)之称。在新郑这个“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精良武器铸造基地窖藏楚弩,应不属韩国军队所为。证明楚汉相争之际项羽在这里驻过兵。伴出楚式弩悬刀的钱窖应属项羽军队。关于钱窖中的一



件铜矛,笔者认为:它可能为秦灭六国从韩国获得大量韩兵器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从秦都取得;或为西楚役使韩地新郑冶铸作坊工匠铸造。钱窖中与兵器伴出的钱币既为这些钱范所铸,证明这些钱范亦属于项羽的西楚政权。“异形布”是西楚的主币,主要流通于项羽所“王九郡”;仿铸先秦各诸侯国货币临时作为分封的各王领地流通货币,以适应战时军费等财政需要和实现政治、经济集权。

这些钱范和钱窖掩埋的不正常现象,应是发生在楚汉相争的最后阶段,即刘邦与项羽决战前夕,楚军撤离新郑时留下的仓皇一幕。

关于“异形布”币的时代和铸行政权归属的论断,关系到历史和货币史及战国疆界,不能似是而非,还需要更多的新资料来证明和深入研究。拙见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批评。

(向在此问题研究中曾给予无私帮助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郑工作站及被拙作引用文献资料的专家、学者致谢。)

拓片:张丽 绘图:李静然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新郑发现“栎尧当圻”陶范》,《中国钱币》1991年第2期。

[2][6][16][25]樊温泉:《郑韩故城发现东周钱窖》,《中国钱币》2006年第2期。

[3]蒙蔡全法、樊温泉二位先生介绍并陪同考察。

[4][9][11][24][26][27]冀和:《关于“项梁铸大钱”补论》,《中原文物》2008年第5期。

[5]汪本初、张振才:《楚币瑰宝——“布布当圻”考释》,《钱币论文特辑》,安徽省钱币学会1989年。

[7][14]罗伯昭:《秦楚之际及汉初货币概论》,《泉币》1940年第2、3期。

[8][10]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2][13]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5]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新出土东周钱范》,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17][18][35]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19][23]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第211~213页。

[20][21]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

[22]刘旭:《中国古代兵器图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28][29][31][32][33][34]《史记·项羽本纪》。

[30][36]《史记·高祖本纪》。

[37]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 On XIANG Liang Casting Coins Based on Newly Unearthed Materials

Ji He

(Suzhou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Suzhou, Anhui 23400)

Abstract: Several groups of coin models and a coin hoard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the Ancient City of Zheng & Han in Xinzheng, Henan, to which, controversies have arisen over the ascription of the irregularly shaped spade coin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coins from various states. An examin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unearthed accompanying weapons,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facts that Western Chu was controlling the manors economy and that the Chu army was defeated in the war with Han reveals that the coin models and the coin hoard should be the remains of Western Chu as the social context reflected by them matche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hu.

Key words: Xinzheng; coin pattern; coin hoard; irregularly shaped spade coin

(本文终校:石磊)